



我说出了 风的形状

刮一场大风
驱散雾霾污染
个人疼痛，时代庞杂
包裹风云际会，沧海桑田
诗积聚所有的一切

杨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说出了
风的形状

杨克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说出了风的形状/杨克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02-013898-2

I. ①我…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2125 号

责任编辑 脚 印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7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页 3
版 次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898-2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辑

诗 林 簿 记

我在《诗刊》的第一声啼哭吼上了头条 / 003

1985 前后的几个片段 / 007

我以青春荐诗歌 / 014

那一年我们走向花山 / 020

一鳞半爪（六则）/ 022

对酒当歌 / 034

以浪为枕，对月而吭 / 037

冲冷水澡和请学生吃饭 / 040

一个诗人与一本诗刊 / 042

我无法伸过手去同你相握 / 045

佐佐木久春教授 / 048

不怕雨不怕风 / 055

候鸟人——诗意生活方式的选择 / 057

因为“魔”的缘故 / 059

在海峡的另一边 / 061

吃虫记 / 069

一个中国诗人亲历的麦德林诗歌节 / 072

第二辑

诗说心语

我说出了风的形状 / 085

两只黄蝴蝶翩跹了百年的花园 / 090

杜甫形象的千年嬗变 / 095

《唐诗三百首》的另一种读法 / 102

“乡儒”的骊歌 / 105

自由的李白 / 108

写作立场 / 110

新世纪新媒介：诗原在 / 117

这是多么美好的诗意生命 / 121

小议几个文学关键词 / 124

大家的“小人之心” / 128

中国诗歌现场 / 130

十三载，诗歌的凝眸 / 137

回到生存和心灵的现场 / 142

诗意地栖居在这大地上 / 144

性感山歌 / 147

第三辑

品藻管窥

-
- 《君山》：马悦然推崇的长诗 / 157
- 倾听朱哲琴 / 161
- 林白：在想象里脱胎换骨 / 163
- 依然坑洼坎坷的世界 / 165
- 普通劳动者的心灵志 / 171
- 漫步在诗歌精灵的国度 / 176
- 骄傲的贫困 / 187
- 没有意味的写作是诗的悲哀 / 195
- 奢靡幻镜折射的生命困境 / 198
- 静水流深涌动的生命狂喜 / 201
- 由简美达至清澈 / 203
- 传统乡土风情与现代女性意识的碰撞 / 206
- 旧情调笼罩下的当代世相 / 209
- 诗意中国的演绎 / 212
- 反向推进：从身体后退到语言 / 217
- 这个民国走来的女子 / 226
- 何处寻觅三家巷 / 229
- 我在每个瞬间听你的侧影，很久 / 234

第四辑

思行天下

-
- 现代化的脆弱 / 241
- 官涌桥随思 / 250
- 云居寺偶感 / 253
- 随想琐记 / 255
- 生与死的N种形态 / 260
- 突兀民风 / 262
- 观察皇帝的一种方式 / 268
- “9.11”：“理想主义”的终结 / 270
- 并不遥远的自行车 / 274
- 断头教堂 / 276
- 夏雨的广州 / 283
- 广州的现代隐喻 / 286
- 德国国会大厦 / 288
- 美女，沙滩椅，结婚树 / 292
- 你不知道的另一条黄河 / 296
- “今天我们去踢球” / 299
- 电视神话 / 301
- 露天电影院 / 304
- 城市身体的变化 / 307

第一辑 诗林笔记

那时我真年轻啊！

三十岁以前生命充满热血，三十岁以后血管塞满尘土。听说一片崖壁上布满了一千多个土红人和动物，如同涂红了手掌，那血的颜色令几条精壮的小伙子激动。

我在《诗刊》的第一声啼哭吼上了头条

——我与《诗刊》

那个血脉偾张的年头，你不吼一嗓子诗歌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青年。
我在《诗刊》的第一声啼哭，一不小心，竟吼上了头条。

1984年末，我写出了第一波小高潮。我以为这一节点是我真正写作的发端。我先写了《走向花山》，那是关于古代壮族先民岩画的一组诗，它们从无文字记载，考验我写作标高的是想象的奇诡，那些战争、祭祀、庆典、爱情场景，是我根据崖壁上的图形展开的联想。这是一组回溯之诗，用骆越先民的歌谣体呈现远古的赭红，气势恢宏而悲壮。它与寻根文学的区别，不仅是一个汉族诗人，写出了原住民的文化之源，而且是从外来者的眼光变成了“内置的、在地性的书写”（邱靖语）。一个诗人对他民族文化呈现必须是少数族裔发自内心接受的。我贴近去写，仿佛我是我外婆，真的相信菜园的枇杷树下住着一只鬼。它发在《广西文学》1985年1月号上。次年二十多个省电台联播过这组诗歌。2016年花山获得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名录，重读这组诗，我很自信广西三十年来写花山的作品，没有超越之作。

如同南极北极，花山向左，深圳向右。我另一首写于1984年底的诗，与上面的诗歌背道而驰，唯一的共同点是建立在想象的经验之上。也许我的写作一开始就有未来主义指向，我对新颖的事物有一种无法自拔的迷恋。我以赞誉的口吻写崭新的城市，写一座在建的中国最高的商业大楼，可我写的时候，我还从未去过特区，这栋名叫国贸大厦的楼也没有建成，我更不知道胡耀邦总书记后来会给这栋楼题名，邓小平南行会在上面眺望深圳。诗叫《在地面与天空之间》，之所以“我萌生了亲近天空的愿望”，

是因为新闻说它最顶部是旋转餐厅。对那个年代居住在绿城南宁的小年轻来说，这实在是太令人啧啧称奇了。钢筋水泥建筑不是凝固的吗？楼的顶部怎么还能转动呀？“那不可感召的离心力，拽着我的思绪悠悠飞翔”。

一组诗追溯过去，一组诗射向将来，它们非现实又是现实，来自想象边界的扩展。

十年后的1994年，美国诗人大卫·艾诗乐评论说：“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不应该抱怨杨克的诗欠缺某种哲学的一致性，杨克的诗浸淫着一种狡黠的聪颖。惠特曼说：‘我自相矛盾吗？一点也不错，我自相矛盾。’杨克是一个现代的玄学派诗人。在他生活着的日益兴旺发达的地域和他的祖国的广大的国土上，他看到了诸多的矛盾，然而他对此津津乐道，礼赞着人类的精神。”

我把这两组诗装进信封，写上《诗刊》编辑部收，从边疆寄往遥远的北京。我没有写任何编辑的名字，我也不认识任何人。

1985年3月，我的诗赫然上了《诗刊》头条。我这写登楼的诗发表九个月后，1985年12月，这座五十三层的超高层楼宇“中华第一高楼”方才竣工。我的诗发表没多久，接通知由广西作协换部门到《广西文学》当诗歌编辑。八十年代期刊为王，作家大多时候只与刊物发生关系，业务骨干都去各杂志社。

1986年赴京，《诗刊》编辑唐晓渡请几个外地诗人一道吃涮羊肉，我才知道我的诗是他从自由来稿中挑选出后送审的。

我觉得很有必要写出责任编辑的名字，一是有恩要感，毕竟是给了我的写作一个平台。再就是倡导一种久违了的八十年代的良好风气，素昧平生，以诗取稿。当下不少谈创作的文章，跟编辑称兄道弟，当然凭的也是质量，总未免让读者心存疑虑。

由此我想展开诗歌写作与散文的根本不同。尽管诗有叙述，或者叙事，但诗歌表达的还是情，情愫、情绪、情怀，总之是情感的元素。《诗刊》发稿两个月后，出版社要出我一册薄薄的诗集《太阳鸟》，我给编辑推荐了林白，一个新人竟然举荐另一个新人出书，可见我好为“伯乐”的毛病早已有之。

随后一年的写作分别在这两个向度展开，“红水河”系列是“花山”的延续，大多发在《青年文学》，有关城市和现代生活的诗歌，则发在《萌芽》《星星》等刊，1986年最后一天，我出席了全国青创会，1987年，《诗刊》通知我到秦皇岛参加“青春诗会”。

那时参加“青春诗会”不是作者申请的，各种评奖亦然。要本人申报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但通知作者后，似乎也是预先交稿，传闻推荐我的编辑是寇宗鄂老师，只是疑似，我们之间从未提起过这事。君子之交淡如水。当然也要感谢刘湛秋先生拍板。我参加的第七届“青春诗会”过后被称为八十年代三个梦之队之一，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力虹、张子选、程宝林、郭力家等。另两个梦之队是首届舒婷、顾城、梁小斌、王小妮、叶延滨、杨牧等，第六届于坚、韩东、翟永明、吉狄马加、阿吾等。

也许诗人有某种密码，仿若接头暗号，如今远在美国的程宝林跟我说：“在北京到秦皇岛的火车上，我凭‘气味’认出西川和陈东东。满火车的人，也没有见过他们的照片，但认定他们是去开诗会的！”之前我也写过，我曾半夜在秦皇岛火车站里晃荡，只上前跟一个旅客打了招呼，他是欧阳江河。巧合的是，只有第一届和我们第七届有幸到北戴河举办。这个地点在中国有象征意味。

有一年《诗刊》出纪念“青春诗会”专辑，我提供了一张与欧阳江河和《诗刊》编辑王家新等人在耀华玻璃厂参观的照片，还有全体“青春诗会”诗人、编辑在海滩上的合影。照片用后《诗刊》肯定退回给我了，可我不记得放在哪了，一直没空找，甚是可惜。当时欧阳江河交的诗有一首没通过，要求他补写一首，上午在耀华玻璃厂采风，我跟他住一屋，半夜醒来，问他活干得怎么样了，他说快写好了，我是最早知道他写出代表作《玻璃工厂》的诗人之一。

我发在“青春诗会”的一首诗《某种状态》，是我最早被翻译为英文、日文的诗，收进美国出版的诗选和发在日本的刊物上，几年后我才知道此事。今年在美国出版的一本英文杂志再次翻译了这首诗，并用我的照片做了封面人物，可见“青春诗会”上的诗至少经受了三十年的时间淘

洗。在秦皇岛的玉米高粱地，我写了《北方田野》，其后我在《广西文学》也编发了一期“青春诗会”同仁的诗，加上欧阳江河推荐的钟鸣的一首，也发在这个小辑中，我自己比较喜欢那首诗。“青春诗会”后回到北京，我去请谢冕老师为诗集《图腾的困惑》作序，序的题目谢老师用了诗中的句子“秋天的语言诞生于这片寂静”。

我有一本诗集《笨拙的手指》，很长时间里我对自己的写作一直有怀疑，我写的在我们那代诗人中有点异类，当时最时髦最叫好的是王寅《想看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那种调调的诗，可我的个人化写作与社会与公共空间总有相切点。在“青春诗会”上，编辑王家新也对我之前发在《青年文学》上几组很火的写红水河的诗有微词，可今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翻译并将出我的英文诗集，他们自己挑选的作品，“红水河”系列选了不少。比如《大迁徙》，这是一场因建设水电站而导致的山民搬迁，批评家邱靖新写的论文说：“宏大的仪式性依然令人震撼不已。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很多南方民族都有着迁徙的历史和口传史诗，杨克真实地体现了少数民族面对现代性的阵痛与伤感。与其说是人文关怀，毋宁说是发自内心的悲歌，这种全球化和现代性对当地文化的冲击，与组诗中的其他章节构成了延续和对应关系。”想不到中国的拆迁延续了三十年，这种本土元素具有时代历史语境的现代在地书写，如今我愈发相信没有问题。

我特别感谢八十年代在《诗刊》工作的编辑，在那个年代马上终结的时日，在编辑部大换班之际，他们还发了我一组新作。

与《诗刊》的情谊迄今未变，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代又一代，川流不息。再说两件有趣的事，1999年我在北京做访问学者时，《诗刊》头条推“每月一星”，李小雨约我写一大组诗，我婉谢了。我说我参加“青春诗会”都十几年了，怎么我还是新星呀？编辑们都笑说我看上去还像新秀。再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办《诗刊》的艰难，那时美国一个风险资金投办一个文学网站，我是参与者之一，听《诗刊》主编叶延滨说起窘境，于是我与网站联系赞助了《诗刊》最初的四台电脑。我们惺惺相惜，我并没有因此给《诗刊》一行诗交换。诗是精神的海洋，水总是相通的。

1985 前后的几个片段

1985 年我比较走运，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太阳鸟》，与其称之为诗集，不如叫诗歌小册子更准确。薄薄的五十来页，二十多首。但那年月能出这样的诗集已很了不起，当时还没有自费出版一说，并非出版社付不起稿费，而是论资排辈，出诗集似乎是艾青、李瑛那样卓有影响的“前辈”的荣耀，跟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没什么关系。之前之后只有叶延滨、王家新等一些青年诗人也出过这种开本的集子。其实在国外，很多著名诗人一直出版只有二十来首新作的册页，只有中国诗人出版诗集以及民刊都愈来愈像买电器，喜欢大型和豪华。

翌年，《太阳鸟》获了广西首届文艺创作“铜鼓奖”。

能碰上这种运气，起因完全是广西民族出版社想推出几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的青年诗人，觉得需要加入同等数量的汉族作者，这样我有幸成为非少数民族的第一人选。我于是推荐了林白和李迅。林白那时还用本名林白薇写诗，开始成为叫林白的小说家还是一年以后的事情。李迅写诗，而他的小说一起步就很醒目，才二十一岁处女作就获了《中国青年》“五四征文奖”，同时获奖的几个人有韩少功、王安忆、陈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各地都有民间文学小团体，我们那个小圈子也是每周隔三岔五见面，为文学争吵，互相读作品，碰上谁家做饭，有什么就随便吃点。林和李之外，还有梅帅元和张仁胜。1985 年我们整天忙于打“百越境界”旗号，主张并身体力行魔幻现实主义加中国寻根再加少数民族地域背景元素的写作。我和梅帅元执笔写了一论和再论，在广西吵得沸沸扬扬，人大复印资料等都转载了。《上海文学》当时把我们的文章和韩少功的《文学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放

在一起，尽管他们影响更大，但说实话我并没有受他们“启发”，因为我跟他们没有任何个人联系，我写的也早于他们几个月发表。只能说是出自生命的敏感。就像这一年前我写了《走向花山》，后来才看到江河《太阳和他的反光》，尚不知欧阳江河在成都吭哧吭哧写《悬棺》。

我写的组诗《红河的图腾》作为要目上了《青年文学》1985年3月号封面，可能是当年这家发行六十万份的期刊唯一的上过封面的诗歌。该组诗后来获得了“1984—1988青年文学奖”，同一奖项的“牛人”要数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王朔《橡皮人》，但后来没有举办颁奖仪式。拖到九十年代，我还是拿到了奖杯和庄重文先生的一点港币奖金，奖座据说太重没人愿意帮从北京带到南宁。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才明白当初我在南宁写诗为何单枪匹马，不是故意追求“孤独”，也不是清高，而是确实没有几个很能写诗的。与我来往较多的诗人是吴小军（无尘）。而写小说的几个“狐朋狗党”甚为了得，李迅把我们主张的小说连续写上了李陀编的《北京文学》，还有《上海文学》，张仁胜拿了国际青年小说奖，梅帅元的中篇作为《人民文学》头条尽管因前一期马健《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被牵连撤掉，后来还是出笼了。林白更是屡有斩获。但最终这一代人的文学还是被历史无情终结了。九十年代以后，这几个哥们都不写小说了，他们跟各省我那批中断文学写作的朋友一样，成了“有钱人”，梅帅元做出品人的《印象刘三姐》被张艺谋演绎在阳朔的山水间，眼下每天都在创造利润；张仁胜为策划者之一的“大地飞歌”国际民歌节，也替他挣了银子；李迅也早就不写了。只有林白和我一直写，所以今天被看成小说家和诗人。但我对这种“坚持”并不感到多少骄傲，1990年年头，《作家》杂志发表了我《观察河流的几种方式》等诗歌，写还是不写，在当时对我而言是个问题。

1985年年中，我当上了《广西文学》诗歌编辑，头一桩活动就是举办全国大学生诗歌征文比赛，这个评奖如今唯一有趣一点的细节是，我上任第一次责编就发了西川“正式出版物”的处女作《鸽子》，他好像念大四了。评委陈建功、王小鹰等都是刚出校门两三年的著名作家。不开会，初评终评都是从北京上海等地把选票寄过来，也许他们都是写小说

的缘故，初评推选西川一票都没有。那年月年轻气盛，我作为编辑个人意见，补进了西川，终评也是同一批评委，西川却反过来拿了唯一的最高奖。列在小说散文之上。奖金相当于大学毕业生两个月的工资，对在校生的他而言也算一美事。

或许是源于生命中的艺术直觉，1985年我闯荡到西南走了一圈，成都、重庆、贵阳如同诗歌圣地。记忆深刻的是被赵野拉到川大旁边的黑屋子里，他们吵吵嚷嚷要高举“第三代”大旗，那个年代这种“非法集会”警察要找你麻烦是不难的。我毕竟是长途坐火车到的，半夜三点实在困得不行，就说我看来当“第二代”算了，独自爬到床上睡觉，迷迷糊糊听他们继续争吵或互相出主意。几年后台湾《创世纪》介绍“朦胧诗”。继而又推出大陆“第三代”小辑，不仅我在其中，宣称自己不是第三代的陈东东在其中，海子还在榜首。至今我都不甚清楚“第三代”的确切含义，两个月前在黄山，“第三代”的发明人赵野说也就是泛指朦胧诗后写诗的那一拨人吧。成都给我的第二印象是吃，也是刚从校园里出来的吉狄马加花了二十八元请我大撮了一顿川菜，这是我吃过的空前当然不是绝后的最贵的饭了，是他大半个月的工资。而他那时连住的固定的床都没有一张，今天成了我辈诗人最大的官。

其实1985年我已经“老江湖”了，跟现在70后80后“大器晚成”不同，“第三代”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十几二十岁就“冒头”了的。我不清楚我出任主编的“晨钟”文学社是不是广西第一个民间文学社团，但肯定是广西同时最早的几个社团之一。因为中国各地只有最早办民间文学社的才知道最初的民刊很少是纸刊，而是大面积贴到墙上去的。到处都有人来抄，我本人贴在墙的诗就在几百里外的另一所学校被大学生集体朗诵。这种墙上民刊因北京“民主墙”的中止才中断。也编过报纸型的，但被点名批评了。我曾主持了广西各主要高校学生文学社的联席会议，打算出一本共同的纸刊，但因为国内大学生联办的第一家民刊《这一代》只出一期就被叫停，我们的自然没问世就夭折了。有的学校参加联席活动的学生，比如广西艺术学院，当年度好些人被剥夺评“三好生”资格，原因不是说文学或诗歌，而是跳了“摇摆舞”，也就是迪斯科。因此我很早就明白

一个原理，有时打击一个人的理由。跟端到桌面的那一个也许风马牛不相及。

因为办文学社的缘故，我竟然也“混”进了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讨论诗歌理论问题的学术会议。那就是1980年的南宁诗会，全称“中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作为大二学生原本无资格与会，我是被抓差去录音。我记得会上最尖锐的支持朦胧诗的发言是孙绍振先生，可以说振聋发聩。谢冕先生题为《新诗的进步》的发言层次分明，相对用词比较温和。但会后谢老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遂有“第一个崛起”。（1995年和孙老师在澳门参加诗会，我还开玩笑说：你干吗会后不发表文章呀？）会上具体肯定朦胧诗人作品的，是诗人公刘，他关于顾城的几首小诗的那篇文章是我根据发言录音整理的，首发（可能是《当代文学学会会刊》之类）署名杨克根据录音整理。九十年代中期去三亚参加一个诗会，在飞机上遇到公刘先生，两人还说起过我学生时代的回忆。会议期间最糟糕（悲哀）的事件，是曲有源被邀请到南宁师院（就是现在的广西师院）做讲座，被听课的告到上面（不知是老师还是学生），这是导致曲有源回去被抓的因素之一（当然还有他参加民主墙贴诗）他当时发在《广西日报》的诗，也是最“先锋”的了。因为他被抓，导致有关部门来找我们要会议的录音带，我和几个参与录音的同学私下议了一下，决定把录音全部洗掉，很可惜这样会议的全部发言录音就没有了。1987年曲有源平反，出狱后第一个活动，就是我以个人名义邀请他来广西一走（还有谢冕、英儿、罗洛等），以表达作为一个广西人的歉意。（他们在南宁期间的住宿等，就是我写诗的朋友吴小军个人出的，其他地方是我找不同部门接待的。）在桂林，当年曾和艾青一起在“桂林文化城”办诗刊的画家阳太阳（当时七十九岁），听闻过程，还专门给我们写了书法条幅，给曲有源写的是“风骨”二字。

我最早认识的“朦胧诗人”是王小妮，她读书期间就有此身份了。毕业分配在长影总编室，1983年来南宁组稿，我主要的任务就是几乎每天转交一封徐敬亚寄给她的信，这种罗曼蒂克恋爱是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后来我还跟她一道去广西电影厂见了张艺谋、张军钊，因为她听说他们